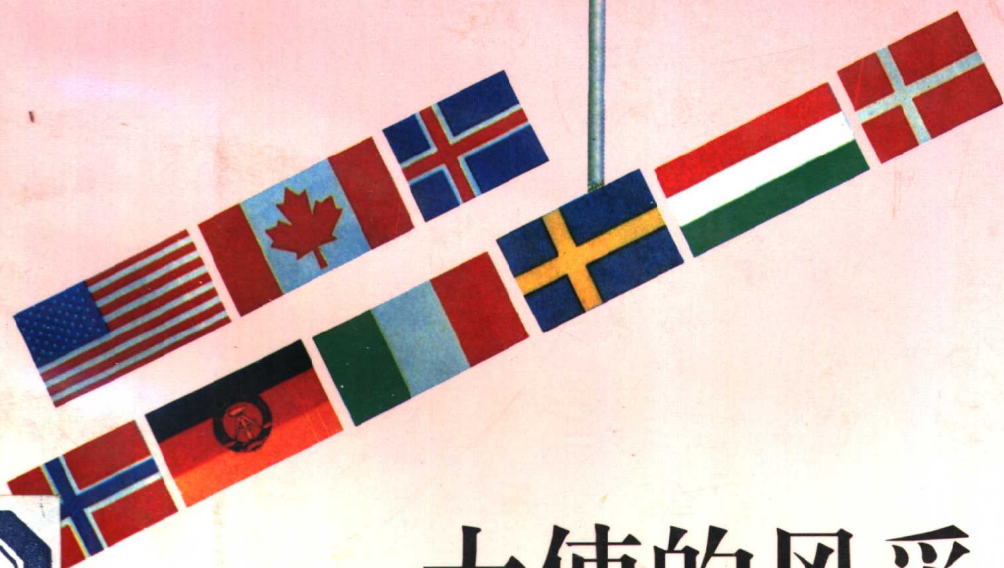


· 新中国大使丛书 ·



大使的风采

翁明 蔡华同 张颖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大使的风采
著 者 翁 明 蔡华同 张颖等
责任编辑 刘 卫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江浦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页 3
印 数 1—5130 册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709—1/D·268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大使,在普通人眼里是神秘的。本书记述了新中国的12位大使,从一个侧面为读者撩开了这一神秘的面纱。你将了解到,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的大使是如何与各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建立联系,广交朋友,推进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而当国家关系处于烟雨迷濛之时,大使们又是如何施展折冲樽俎的外交艺术,维护祖国的尊严,使两国关系出现朗日晴空。书中还穿插介绍了这些大使们从将军、学者而成为外交官的不平凡经历,并披露了中国同前苏联、美国、印度、阿尔巴尼亚、泰国、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国关系中的一些内幕。

ISBN 7-214-01709-1

D · 268

定价: 14.00元

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新中国大饭店》

持节使异域
结谊通全球

耿飚



九三年春

目 录

新中国第一位大使王稼祥	翁 明(1)
将军外交家耿飚	蔡华同(12)
冷暖华盛顿	
——黄镇使美纪事	尹家民(54)
首任驻印大使袁仲贤	裴默农(114)
谈判高手王炳南	张 容(136)
居美岁月	
——随章文晋使美散记	张 颖(158)
焦若愚——从大使到“村长”	
.....	高 岩 漆 露(211)
七任大使王幼平	范振水(233)
曾经欧非亚	
——记使美之前的柴泽民	王 凡(242)
临危受命	
——朱启桢大使纪事	金伯雄(256)
四度出任大使的徐以新	李 樵(263)
范承祚大使其人其事其诗	翁 明(338)

新中国第一位大使王稼祥

翁 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中央人民政府的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周恩来外长在公函中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这就表明了，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中国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也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照会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苏联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一贯愿望，决定苏中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同日，苏联政府宣布断绝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从广州召回苏联的外交代表。10月3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表示欢迎立即建立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毛泽东主席决定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43岁的王稼祥出任驻苏联首任大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大使。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红色教授和苏联问题专家。

10月20日晚7时，王稼祥出席了毛泽东为欢迎苏联驻华首任大使罗申举行的宴会。毛泽东握住王稼祥的手说：你今晚就要去莫斯科当大使了，我们在莫斯科再相见。王稼祥关怀地望着毛泽东说：请主席保重身体，工作之事，周总理都亲自作了交代。三个小时后，他与夫人登上了北京直开莫斯科的长途国际列车。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的社论。这是我国报纸为大使赴任发表的唯一一篇社论。王大使一行，于10月30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交部热烈的欢迎。

王稼祥大使递交国书后，拜会了苏联各部委、驻苏各使团，同时着手筹建使馆，制订各种规章制度。而最主要的工作，是围绕着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进行的，常忙得他顾不上吃饭睡觉。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苏联党和政府将为他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都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也被应邀访苏。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重要外事活动，意义十分重大。作为驻在国的大使，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离京赴莫斯科，呼啸的专列穿行在千里冰封的东北大地上，进入了白雪皑皑的贝加尔湖。专列到达雅罗夫斯基车站，专程从莫斯科来接毛泽东的王稼祥大使登上专列，他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可把你盼来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拉着王大使的手说：“稼祥同志，你辛

苦了。我这次来，可少不了你这位苏联问题专家哟！”

12月16日正午时分，莫斯科市伊万大帝钟楼上，古老的大钟敲响了12下，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开进了莫斯科北站。一刹间，钟声、车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军乐齐奏。王稼祥大使十分满意苏方在礼仪上的精心安排。

在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莫斯科天气与北京相比冷得厉害，令人难以适应。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由莫洛托夫相陪乘汽车到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战时的住所——孔策沃别墅休息。这里按王稼祥的话说：环境优美，内部舒适，设备齐全，服务周到。毛泽东住下后，莫洛托夫说：下午6时，斯大林约毛泽东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送走了莫洛托夫，王稼祥对毛泽东说：我得回使馆看看，一方面向中央报告主席平安到达莫斯科，苏方欢迎的情况，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一下今晚斯大林会见主席的安排。毛泽东表示同意后，王大使便赶回市内我驻苏大使馆。

下午5时许，斯大林派车接毛泽东一行。克里姆林宫的客厅挂钟敲了6下，工作人员请毛泽东进入会议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排成一队，欢迎毛泽东一行。站在前面的是斯大林，身着威武的元帅服，容光焕发，头发、胡子都梳得发亮。在他身后的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王稼祥陪同毛泽东主席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紧紧握手、互相问好时，作为驻苏大使，比别人更能深刻体会其中的重大意义。

两位领导人初次见面，寒暄后，斯大林称赞毛泽东伟大、年轻、健壮，并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继续前进。”毛泽东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对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援助。双方从前线的军事情况到经济建设，从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从粮食生产到群众工作，海阔天空，有如久别的战友，侃侃而谈。敏锐机灵而富有经验的王稼祥，已揣测到这是斯大林在摸毛泽东此行的意图。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斯大林问毛泽东有何愿望和要求。毛泽东表示，这次来苏联一是祝贺斯大林 70 寿辰，二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看一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斯大林听后，吸了一口烟斗说，你是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按说斯大林应该清楚 7 月份刘少奇内部访苏时，曾提到要苏联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生产，要签订个新协议，以代替苏联与国民党签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斯大林就是不主动说出。毛泽东看斯大林没有点明就幽默地说：“恐怕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东西，这个东西，既好吃，又好看。”苏方人员听后大笑，表示这话充满深邃的哲理和东方的幽默。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好吃，要有实际内容。”但毛泽东不肯点明。苏方实际上是明白，就是不主动提出。

几天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约见王稼祥大使，他拐弯抹角地说：

“大使同志，如果可能，您是否说说，在你们中国，这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指的是什么？这么说又意味着什么？”

王稼祥坦诚地说：1945 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这个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达成的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密约。现在新中国已经诞生了，苏联已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理应予以废除，苏联应与新中国重签一个条约，代替旧条约，使今后两国关系有章可循。毛主席说的“好看”，就是让世界人民看

看；“好吃”，是指新中国刚诞生，战争还没完全结束，国家有一定困难，百废待兴，需要苏联老大哥给予援助。王大使把毛泽东的幽默语言巧妙地向维辛斯基破译，同时又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苏方明确了毛泽东幽默的内涵，便立即行动起来了。

斯大林 70 寿辰庆典后，苏联政府拟请毛泽东及随行人员观看一出据说是反映中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富有革命斗争经验、办事精细的王大使，事先派夫人朱仲丽和政务参赞曾涌泉前往观看演出。这个舞剧叙述的故事是 20 年代初，一艘苏联货船停泊在中国某个海港时，有个船员结识了一个中国歌女，他向歌女宣传理论，这个歌女有了觉悟并参加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并取得了胜利。

“简直荒谬绝伦”。一向文质彬彬、沉静少言的王稼祥，听后十分气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经过几十年流血牺牲取得的，怎能归功于一个苏联船员一个中国歌女呢？这个舞剧不仅是胡编乱造，而且是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和侮辱。”

大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谢绝了苏方的邀请，并以中国大使馆的名义对舞剧提出了批评，建议停止公演。苏方接受了批评，该舞剧从此胎死腹中，再没有公演。

毛泽东对王大使维护本国主权和尊严，处理问题果断、严肃、认真的态度，予以肯定。

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的各国代表团，都陆续回国，毛泽东等待周恩来总理前来莫斯科签约，苏方对毛泽东的活动连续几天没有报道。英国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将毛泽东软禁起来了。为此王稼祥大使会见维辛斯基外长，建议用答记者问的形式戳穿西方资产阶级的造谣污蔑。1950 年 1 月 3 日我

《人民日报》、苏联《真理报》分别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毛泽东在莫斯科回答塔斯社记者的提问，其中的两条是：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的各項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具告？”

答：“在这些問題中，首先是中苏友好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协定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于1月15日，在苏方人员及王稼祥大使陪同下，乘车抵达列宁格勒，实现他“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

波罗的海，天寒地冻，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雪与冰连在一起，陆地与海洋难以分清。毛泽东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漫步，举目远眺，激情满怀地说：“革命江山真雄伟，千里冰封啊！”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参观了俄国十月革命发起暴动之地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观了冬宫展厅及沙皇办公室、藏书室。毛泽东在大雪纷飞中，一定要看看列宁住过的茅草房。参观后，他对王稼祥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俄人民，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过了3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以及王稼祥、陈伯达到车站欢迎。

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有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吕东、欧阳钦、张化东、赖亚力、柴树藩等中央和地方的财贸、外交方面的专家。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主席的指示，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

由于周恩来的到达，王稼祥大使的工作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苏两国谈判之中。谈判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实际工作在周恩来、李富春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之间进行，根据所谈内容要划分若干个小组，王大使穿插于各层次、各组之间。

会谈首先解决条约问题，按毛泽东的说法是要“好看”的。苏方先交了第一稿《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周恩来与代表团主要成员研究认为不行，需要大的修改，会谈中有的内容没写进去。王稼祥说条约名称与苏联和国民党签定的那个一模一样。周恩来说：这个条约不是单方面的恩赐，应加上“互助”二字，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汇报给毛主席，主席说：“对，应该加上互助两字，平等互利，互相帮助嘛。”

在周恩来亲自带领下，用整整两天时间，逐字、逐句、逐段推敲。王稼祥动员使馆同志全力以赴，查资料，找依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与国之间第一个重要外交文件，要在条约中体现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品格，不允许依附于人的屈辱外交再现。伍修权提出：苏联的稿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写成倒装句“人民共和国中华”。周恩来说：“那当然要改过来，否则后患无穷。”他接着说：这个条约不仅今天看行，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检查，从国家利益出发，不能出漏洞，防止

吃亏。修改后的条约经毛泽东审阅后交给苏方，苏方没有提出异议。事后他们说，中方改得很完美，体现了苏中关系是友好平等的。

接着会谈《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经过 25 天的紧张工作，中苏双方于 1950 年 2 月 14 日在克里姆林宫由周恩来外长、维辛斯基外长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文件。毛泽东和斯大林亲自出席仪式，签字后亲切握手，互致祝贺。

王稼祥大使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斯大林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席间频频祝酒，周恩来和斯大林即席发表讲话，为中苏友谊干杯，为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干杯。

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乘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王稼祥送别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动员全馆同志进行主席访苏的总结，并布置收集各国、苏联各界对中苏条约的反映，及时整理成文字报告了外交部。

1950 年 4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工作，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

中央通知王稼祥大使：“王明（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携妻子孟庆树到莫斯科治病。”但没说明如何接待，是否需要使馆

与苏方联系。

王明到达莫斯科既不住院治疗，又不到疗养地休息，而是穿梭于苏联领导人之间，凭借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的关系，走东窜西，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王稼祥很看不惯他那种小市民的商人作风。一天王明来到使馆要找老乡（都是安徽人）、老同学（苏联中山大学）单独“叙叙旧”，说说“心里话”。王稼祥从王明阴阳怪气的语调中，判断出是别有用心，于是在客厅请政务参赞曾涌泉及朱仲丽共同陪见。王明提出单独会见大使，没想到安排两位高级馆员陪同，于是便试探性地发牢骚说，“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不当，不予重用”，“国内医疗条件太差，老病好不了，又添了新病”。王稼祥见他东扯西拉，散布对中央的不满，便冷静地瞧着他，王明自觉没趣，老乡和同学连同情心都没有，只好搭讪告辞。

隔不久，斯大林因事约见王稼祥，说完事情后他说：“你们的王明同志正在莫斯科治病，你应该多关照他。”

王稼祥意识到王明在斯大林面前吹了歪风，联想到莫斯科上层流传着一些对于中国党的流言蜚语，说什么“中国党内有两派”，“中国出现了一个铁托”（铁托因反对斯大林干涉内政，被斥为共产国际的叛徒）。显然这是与王明在苏共中央活动有关。于是王稼祥郑重地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提醒，我对王明同志比您更了解，他如有病应该到医院治疗，他在莫斯科到处跑，恐怕不是为了治疗，我无力也没有必要去关照他。”

向来说一不二的共产国际的权威，见自己的“指示”遭到拒绝，便不满意地回身进屋了。

王稼祥大使将王明在莫斯科的活动、苏共的传言以及斯大林的态度，如实上报党中央。

1950年冬，一次王稼祥大使被召进克里姆林宫，有好几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在场，好像是刚开完会。斯大林热情地接待了王稼祥。“我们有个设想”，斯大林笑咪咪地说，“希望康莫纳尔同志（1925年王稼祥在中山大学时的俄文名字）能拥护促其成功”。王稼祥意识到，凡是斯大林称他俄文名字时，都表示亲昵，谈重要问题，便说：“尊敬的维沙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请您讲吧。”

“亚洲的北朝鲜、蒙古、越南，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在这些国家掌权执政，为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组成一个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斯大林怕王稼祥不解其意，接着说：“就像苏联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间所处的地位一样，请康莫纳尔同志发表你个人的看法。”

王稼祥并没想到斯大林要提的问题，听后认为这实际上是用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模式，来强求亚洲各国照抄照搬，这种组织形式并不适合我国及亚洲兄弟国家的国情。他认真思考后说：

“斯大林同志，您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心是令人敬佩的。只是在具体方法上，要考虑到种种现实情况。按照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各兄弟党和国家可以相互支援，在共同意愿时，可以采取联合行动，但必须相互协商，尊重各国人民民族的利益和感情，如果强求他们服从外来的意见，将是不适宜的。”他停顿片刻，发现斯大林很认真听他所讲的，接着说：“中国有句成语，叫‘欲速则不达’。当本国人民还没有这个愿望和要求时，再好的建议，也难以被理解和接受。我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学生，向您坦率地陈述

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和教导。”

斯大林听了后很高兴,欣赏这位康莫纳尔的坦诚态度,手拿烟斗站起来,边走边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谈话结束后特意留王稼祥共进晚餐。

作为首任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于1951年2月奉调回国,筹建中共中央联络部,参与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外交和兄弟党方面许多重大决策。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